

区域国别研究中的人类学角色探析

——以英美中人类学的区域国别研究为例*

刘琪 杨成

内容提要 作为交叉学科的区域国别研究,是当前国内学界新的增长点,其中,以“理解他者,理解世界”为使命的人类学当扮演重要的角色。本文对传统上的两个大国——英国、美国的区域研究进行了梳理,并对人类学在其中所做的知识贡献进行了剖析。认为人类学在方法上所倡导的田野调查,可为跨文化理解提供基础性的知识。此外,人类学对跨区域、跨国别流动性的关注,可作为以国别为单位的研究的有益补充。在新时代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中,人类学应当将传统学科特色与中国国情进行有机结合,并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指引下探索新的理论与方法维度。

关键词 区域国别研究 人类学 田野调查 文化自觉 人类命运共同体

2022年9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印发《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2022年)》,区域国别学正式成为交叉学科门类下的一级学科。顾名思义,区域国别学是以某个区域或某个国家为研究对象,对所研究区域和国家的社会、文化、历史等方面进行细致研究的学问,它一方面服务于国家外交战略,一方面建立学术资料库,逐步丰富完善对世界的整体性认知。在时代的诉求之下,构建中国特色的区域国别学术体系、学科体系、话语体系,以超越此前西方民族中心主义的学术构建,成为当前学界义不容辞的任务。^①

不同于传统的国际关系学,区域国别研究以交叉学科与深度知识为特点,其中,人类学、历史学、地理学、民族学、政治学等学科均可做出自己的知识贡献。当前,关于各学科在区域国别学中的知识角色,已有初步的探讨^②,本文将着重于讨论人类学的知识角色。人类学诞生于西方与世界其他地区遭遇的历史进程中,从一开始,它便以“理解他者”为己任,研究对象是西方以外的世界,这也使得它与区域国别研究之间有着天然的亲和性。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由于整体世界格局的不同,人类学所生产的知识也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本文将首先梳理英国与美国的人类学在区域国别研究中的知识角色,并进而讨论在中国当前语境下,人类学可在区域国别知识供给中起到怎样的作用。

* 教育部首批新文科研究与改革实践项目“基于‘多语种+’和‘HAG+’理念的新时代全球治理卓越人才培养创新与实践”(项目编号:2021110049)阶段性成果。感谢《世界民族》编辑部老师和评审专家的修改意见,作者文责自负。

① 参见陈恒:《超越以西方话语霸权和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区域研究》,载《学海》,2022年第2期。

② 如梁占军:《世界史视域下的国别区域研究》,载《光明日报》,2021年12月13日第14版;汪卫华:《“解耦”还是“脱钩”?——比较政治与区域研究的关联》,载《国际政治研究》,2021年第6期;张青仁:《人类学参与区域研究的历史逻辑》,载《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社版)》,2021年2期。2022年11月26日召开的中国世界民族学会年会,亦以“区域国别学视域下的世界民族研究”为主题,就区域国别学与世界民族研究的融合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一、“理解原始人”：二战前的英国人类学与区域国别研究

作为早期的殖民帝国,英国是最早开始现代化进程,也是最早开始“走向世界”的国家。早期,富有探险精神的传教士与商人留下了许多关于异国风情的记载,到了19世纪,随着现代大学学科体系的设立,人们开始不满于这些带有强烈主观色彩的叙述,进而寻求在经验发现基础上的“客观”知识。社会科学中诸多学科的创立,便是这项一般性工作的一部分。很快,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便划分了自己的学科领地。这些学科的研究区域主要限于发源地的国家,它们的学科目标在于对现代国家的社会现实进行描述与解释,并解决随现代性而来的诸多社会问题。与此同时,随着殖民的进程与现代世界体系的建立,欧洲人开始与世界其他地区的人群相遇,并在多数情况下伴随着对这些人群的征服。从欧洲人当时的经验范畴来看,这些“原始人”是与欧洲人截然不同的人群,需要用一种完全不同的方法,甚至需要一门完全不同的学科来进行研究。于是,人类学应运而生。^①

可以说,在学科诞生之初,人类学是由研究对象来界定的——它研究的是欧洲之外的“他者”。在这一时期,英国在国内与海外实行的政策有着显著区别——对内,致力于全民自由,改进道德与智力;对外,尤其是在殖民地区,则施加压迫与暴行。^② 这样的政策背后,蕴含着强烈的种族主义理念。大多数英国人都带着文明等级论的有色眼镜去看待殖民地的土著人群,同时,辉格党中的一些激进主义者在人文主义的影响下,也开始对殖民政策进行批评,并推动关于土著人性格、习惯与需求的分析。作为辉格党商人之子的人类学家泰勒(E. B. Tylor),便是其中的一员。泰勒深信人类的心智同一性,并在此基础上试图解释欧洲人与土著人之间的差异。通过寻找文化中的“残存”,泰勒在土著人与传统欧洲之间建立起了关联,认为前者是“曾经的欧洲”,并相信,在对土著人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我们可以构拟出人类文明发展进化的历史。

以泰勒为代表的人类学家,是英国的第一代人类学家,也被称为“摇椅上的人类学家”。他们的观点更多建立在内省思辨的基础上,而不是实地的田野调查。当时的人类学家带有强烈的欧洲中心主义心态,认为欧洲是文明发展的顶端,世界上的其他人群、其他民族都必须以欧洲为榜样和目标。虽然在方法与观念上都有明显的缺憾,但至少,他们试图对不同种群、不同民族相互区别的身体与精神特征进行分析,并寻找产生这些特征的原因,这为之后“科学”的人类社会研究奠定了基础。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战后,世界格局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几个传统帝国的解体,使得东欧、中欧、欧亚地区出现了很多新兴的独立国家,英国也相应成立了一系列研究机构,以服务于新时期的政府战略。如1915年建立的伦敦大学学院斯拉夫东欧研究院(UCL School of Slavonic and East European Studies)、1916年建立的东方和非洲研究学院(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SOAS)、1920年建立的英国国际事务研究所(British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都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同时,从知识上,也产生了对新兴国家与英国殖民地进行调查,获取更深入的所在地知识的需要。恰在此时,人类学学科内部亦出现了新的、以实地考察为标志的方法,这便使得人类学与区域国别研究之间产生了“偶遇”。^③ 这种偶遇,要归功于被誉为“现代人类学之父”的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Kaspar Malinowski)。

^① 参见[美]华勒斯坦等著,刘锋译:《开放社会科学:重建社会科学报告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

^② 参见[挪威]弗雷德里克·巴特等著,高丙中等译,宋奕校:《人类学的四大传统——英国、德国、法国和美国的人类学》,商务印书馆,2015年。

^③ George W. Stocking, “The Emergence of British Social Anthropology”, *American Anthropologists*, vol. 96, no. 3, 1994, pp. 721–723.

马林诺夫斯基并非前往原始部落从事田野调查的第一人,他最大的学术贡献,在于对田野工作方法的系统的、综合的阐释。马林诺夫斯基的田野调查,最初源于一起意外^①,然而,随着田野调查的展开,他显然深信,这种长期与土著人生活在一起,并对土著人的生活进行参与观察的方法,是能够真正达到对他们客观认识的唯一方式。在《西太平洋的航海者》的导论里,马林诺夫斯基用掩饰不住的骄傲口吻写道:

民族志田野工作的首要理想,在于清晰而明确地勾画一个社会的构造,并从纠缠不清的事物中把所有文化现象的法则和规律梳理出来。他必须首先探知部落生活的骨架。这一理想迫使我们必须把全面调查作为第一要着,而不要专挑那些耸人听闻的、独一无二的事情,或等而下之,找那些滑稽可笑和离奇古怪的事情,把土著人当作一幅扭曲了的、孩子式的漫画提供给我们,我们可以忍受这种描述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这幅图画是虚假的,而且,像许多谎言一样,它也被科学戳穿了。^②

这段话,被此后数代的人类学家奉为圭臬。从此,人类学的目标不再是用二手材料构建虚拟的“人类发展史”,而是亲身来到土著人之中,探究他们的整体性生活方式。正如马林诺夫斯基所言,当西方人初次来到“原始社会”的时候,会发现他们有难以理解的、光怪陆离的习俗,只有像人类学家一样深入当地,才会“把那个耸人听闻的、野性的、不可名状的‘野蛮人’世界,转化成秩序井然的社区。”^③它意味着对地方社会的所有方面都进行描述,从亲属称谓到生计方式,从土地权力到政治组织,从交换方式到仪式体系,不一而足。马林诺夫斯基认为,要理解原始人,首先便要抛下作为西方人的自傲,把任何一种风俗、任何一项制度的存在,放在当地的整体社会秩序中考察,并找出它为了满足人类需要所发挥的功能。^④这种功能论虽然有着诸多缺憾,但它相对于此前的文明等级论,已经前进了一大步——它不再把原始人视为欧洲人的“早期阶段”,而是在整体主义的视角下,考察不同社会满足需求的不同方式。这意味着对原始人的研究正式成为了一门“科学”。

马林诺夫斯基倡导的这套方法,恰好满足了当时英国当局的需要,这也使得他及所代表的人类学在英国一举成名。^⑤人类学家深信,他们所提供的关于“土著民族”的知识,可以为英国的殖民统治提供极大的帮助。如与马林诺夫斯基齐名的另一位人类学家布朗(A. R. Radcliffe Brown)即写道:

对土著民族的习俗和信仰的研究,其目的不仅仅是构拟其历史,而是发现它们的意义和功能,它们在思想、道德和社会生活中所占的地位。这些能给那些传教士和国家官员提供极大的帮助,他们是致力于解决土著文明适应新条件的过程中所产生的实际问题的,而这些新条件是由于我们国家的占领才产生的。^⑥

布朗随后举例说道,例如,非洲有一种习俗叫 lobola,它指的是男人在娶女人时需要支付的巨额彩礼,这看起来是一种陋习,但殖民地的行政官员并不清楚,贸然废除或者阻止它会带来什么后果。这个时候,人类学家关于当地的知识便会派上用场。或者,当传教士接触到各种原始社会的神

① 关于这起“意外”的前因后果,可参见〔英〕亚当·库珀著,沈沉译:《人类学与人类学家:二十世纪的英国学派》,商务印书馆,2021年。

② 〔英〕马林诺斯基著,梁永佳、李绍明译,高丙中校:《西太平洋的航海者》,华夏出版社,2002年,第8页。

③ 〔英〕马林诺斯基著,梁永佳、李绍明译,高丙中校:《西太平洋的航海者》,华夏出版社,2002年,第7页。

④ 〔英〕马林诺斯基著,费孝通等译:《文化论》,中国民间文学出版社,1987年,第34—36页。

⑤ 见费孝通:《重访英伦》,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87页。

⑥ 〔英〕拉德克利夫-布朗著,夏建中译:《社会人类学方法》,华夏出版社,2002年,第29页。

秘信仰与巫术时,也并不知道该如何消除它们,只有人类学家,才能准确地告诉传教士,巫术在当地整体社会的运转中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对于殖民地的行政管理,布朗认为应当建立在对土著文化彻底而系统的了解之上,而正是在这里,人类学可以“为土著民族的管理和教育建立一个科学的基础”^①。

布朗所构想的人类学,一方面应当是通过比较研究,寻找“文化类型”,并进而找寻人类社会普遍法则的学问;另一方面,在某个特定的社会中,又可以提供关于当地的深度知识,进而使大英帝国能够“根据知识和理解对附属民族进行公正的统治”^②。正是源于这种深度知识的提供,人类学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英国政府的欢迎,甚至某些高校的人类学系还参与到了殖民地官员或殖民军官学校的学生的教学之中^③。

在这一时期英国的区域国别研究中,人类学做出最大贡献的,当属非洲研究。自19世纪末以来,英国在非洲占据了大片的殖民地,此前被视为圭臬的“间接统治”制度,到了20世纪30、40年代,开始出现越来越多的问题。20世纪30年代初期,英-埃苏丹政府资助人类学家埃文思-普里查德(E. E. Evans-Pritchard)前往非洲中部的努尔地区进行了长期田野调查,以提供关于努尔人的生活报告^④,此后,埃文思-普里查德与福蒂斯(M. Fortes)两位学者又共同组织了一个研究团队,对整个非洲地区政治制度进行了比较研究。^⑤

这项比较研究的成果,便是享有盛誉的《非洲的政治制度》。几位人类学家通过对八个非洲社会的深度考察,将非洲的政治制度分成了两个类别,其中一类是拥有中央集权、行政机器和司法制度的社会,即“原始国家(primitive states)”,另一类是缺乏中央集权、行政机器和司法制度的社会,即“无国家社会(stateless societies)”。他们指出,在前一类社会中,间接统治的原则可以很好地适用,只要传统上地方的最高统治者能够巧妙平衡殖民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关系,便可以减少新旧制度之间的摩擦。而在后一类社会中,由于权力是裂变的,因此,便没有一个可以代表裂变支之间的团结的人物。在这样的社会中,如果采用间接统治的方式,反而会起到相反的效果,正确的方式是委任新的行政代理,建立起官僚体制,并用武力加以支撑。^⑥

埃文思-普里查德与福蒂斯所在的牛津大学,在当时是反对应用研究的大本营,然而,在这本书中,可以看到作者们的双重心态——一方面,他们宣称,这本书首先是为人类学家提供便利的参考书,并为比较政治学科做出贡献;另一方面,他们也承认,人类学家并非对实践事务漠不关心,书中所记录的政治制度的变化,正是欧洲的征服与统治带来的,而如果书中讨论的非洲政治制度原则能够被人理解,“从长远来看就是有利的”^⑦。可以说,这本书的成果及其代表的非洲研究,正是当时人类学与英国当局关系的缩影:人类学家所倡导的对土著社会的深入理解,及其从整体社会结构出发的观察,为英国对其他区域、其他国家的了解做出了不可或缺的知识贡献,然而,人类学家内心深处并不愿意直接为殖民政策服务,甚至对总体上的殖民扩张持有批判的态度。虽然人类学的知识生产无法离开英国整体的殖民背景,但它仍保留了一定程度的知识独立性,甚至更多地偏向土著

① [英]拉德克利夫-布朗著,夏建中译:《社会人类学方法》,华夏出版社,2002年,第87页。

② [英]拉德克利夫-布朗著,夏建中译:《社会人类学方法》,华夏出版社,2002年,第88页。

③ 参见[挪威]弗雷德里克·巴特等著,高丙中等译,宋奕校:《人类学的四大传统——英国、德国、法国和美国的人类学》,商务印书馆,2015年。

④ [英]埃文思-普里查德著,褚建芳、阎书昌、赵旭东译:《努尔人——对尼罗河畔一个人群的生活方式和政治制度的描述》,华夏出版社,2002年。

⑤ 参见[英]M.福蒂斯、E. E.埃文思-普里查德编,刘真译,刘海涛校:《非洲的政治制度》,商务印书馆,2016年。

⑥ [英]M.福蒂斯、E. E.埃文思-普里查德编,刘真译,刘海涛校:《非洲的政治制度》,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25—26页。

⑦ [英]M.福蒂斯、E. E.埃文思-普里查德编,刘真译,刘海涛校:《非洲的政治制度》,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14页。

人而非殖民政府的立场。^① 这种知识独立性,也使得人类学留下的知识遗产,在百年后的今日仍旧具有参照价值。

二、文化多样性的求索:人类学与美国的区域研究

二战之后,世界格局发生了显著变化。传统的欧洲强国实力大不如前,英国的殖民体系也土崩瓦解,与此对应,大西洋对岸的美国却迅速成为新的世界霸主。根据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的回忆,在珍珠港事件之前,美国一直奉行孤立主义的政策,甚至拒绝加入当时的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当时,美国只有菲律宾一个重要的殖民地,而且,它自身也难以摆脱作为英国“前殖民地”的尴尬身份。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则以戏剧性的方式改变了这一切。战后,前殖民主义大国的殖民版图基本消失,美国在国际关系中开始扮演重要角色,成为联合国的核心组织者,联合国总部也位于纽约。这一时期,美国迫切需要建立起与自身世界地位相称的知识体系与外交体系,区域研究(area study)的发展,正是这一总体知识体系建设下的重要组成部分。^②

从美国人类学的发展来看,20世纪早期,奠基性人物博厄斯(Franz Boas)便旗帜鲜明地反对文化等级主义,进而提出了著名的“文化相对论”主张。这一主张认为,在对任何一种文化进行理解的时候,都应当根据他们自身的术语,并将其放置于自身的历史情境之下,而不是随意对文化等级的高低进行评判。博厄斯相信,世界是由许多不同的“文化区”(culture area)组成的,而人类学研究的任务,便是从语言、生态、人格、心理等方面识别出这些文化区,并对其文化特征进行概括。博厄斯及其弟子同样推崇马林诺夫斯基式的田野调查方法,但与英国人类学对社会组织、社会结构、社会制度的关注不同,美国人类学更注重“文化”对一个社会或一个民族潜在心理结构与人格特质的塑造。他们相信,不同文化会塑造不同的“民族性格”,这些不同的“民族性格”,可以为当今世界中的许多事件提供解释或预判。

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美国人类学家便开始了关于世界部分地区知识的积累。如耶鲁大学便受命建立了人类关系区域档案(Human Relations Area File),成为二战中军方使用的太平洋地区资料汇编。^③ 博厄斯的学生鲁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则受命在战争即将结束的时候研究日本,并由此提出对战争后期盟国应该如何对待日本天皇的建议。这项用“文化遥距法”展开,对文化与人格关系进行深度分析的研究,成为后世人类学家津津乐道的案例。^④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人类学家对战争进行了更为直接地参与,如有人类学家在军中教授语言和地区知识课程,也有人人类学家应征到日本隔离营进行社会分析。这使得人类学的知识贡献被当局重视,也为此后人人类学在区域研究中的参与奠定了基础。

1958年,著名的《国防教育法案》通过,对区域研究给予了大量资金支持。各大高校纷纷设立区域研究的相关机构,关于区域研究的总体研究规划设计,也在被称为美国社会科学的“旗舰组织”的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SSRC)的推动下展开。^⑤ 从美国区域研究创生初期的几份重要报告来看,从一开始,学者们便对区域研究的交叉学科特征达成了共识,

① 关于人类学对英国当时殖民政策的总体影响,可参见 Asad, Talal (eds), *Anthropology & the Colonial Encounter*, New York: Humanity Books, 1973, 作品内容。

② [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著,徐德林译:《椰壳碗外的人生》,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40—42页。

③ 参见[挪威]弗雷德里克·巴特等著,高丙中等译,宋奕校:《人类学的四大传统——英国、德国、法国和美国的人类学》,商务印书馆,2015年。

④ 参见[美]鲁思·本尼迪克特著,吕万和、熊达云、王智新等译:《菊与刀——日本文化的类型》,商务印书馆,1990年。

⑤ 牛可:《地区研究创生史十年——知识构建、学术规划和政治-学术关系》,载《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6年第1期。

而人类学家则积极参与到了美国区域研究的规划与实践之中。^① 在由人类学家威廉·芬顿(William Fenton)撰写的“芬顿报告”中明确提出,需要特别关注人类学、历史学、地理学三门学科在“整合性区域研究”中所起到的作用。^② 著名生态人类学家朱利安·斯图尔德(Julian Steward)撰写的报告中,则明确将培养学生及学者形成文化相对主义的意识,以及提供关于区域文化整体的理解,作为区域研究的核心目标^③。此后,很多人类学家都或主导或参与各类区域研究项目,其中,最为值得一提的,当属人类学在东南亚研究中做出的知识贡献。

美国的东南亚研究,主要是在福特基金会与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下展开的,它们先后在耶鲁大学与康奈尔大学推动创办了跨学科的东南亚专业,并给予了长期的经费支持。这两个基金会倡导为专业性的学术工作创造必要的体制空间,这样的理念,使得东南亚研究得以在一定程度上规避功利主义的现实导向。例如,福特基金会虽然希望康奈尔大学提供关于印度尼西亚共产主义情况的报告,但他们在给予资助的时候,也同意康奈尔大学将调查范围扩大到当代社会与政治生活的所有面向。^④ 此外,与其他边界相对固定、文化相对清晰的区域不同,作为区域的“东南亚”本身便是在二战中及战后才逐渐形成的,而这一区域的文化、族群、宗教多样性又远超其他地方。这种文化多样性,恰好为人类学家的深度调查提供了绝佳的舞台。

在东南亚,人类学家应用并改善了此前博厄斯推崇的“文化”概念。一方面,受符号学的影响,格尔兹(Clifford Geertz)将文化定义为“经由象征符号获得和传达的行为模式”,并指出,作为文化分析的人类学“不是一种探索规律的实验科学,而是一种探索意义的阐释性科学。”^⑤ 另一方面,秉承博厄斯对历史的关注,人类学家相信,在不同区域、不同人群中存在着某种长时段的“文化气质”,这种“文化气质”会对近期发生的政治事件造成深层次的影响。如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便通过对经典爪哇文献的解读指出,当地传统中根本没有西方意义上的“权力”概念,这使得他们在面对现代政治转型时,只能从经典文献中随意拎出一些要素来拼凑,使新建立的政体缺乏内部的一致性^⑥。格尔兹在1980年出版的作品《尼加拉:十九世纪巴厘剧场国家》,也呼应并进一步发展了安德森的观点。^⑦ 在这本书中,格尔兹提出了著名的“剧场国家”概念——在这样的国家形态中,仪式庆典本身才是目的,而权力与支配的需求则是服务于庆典的。由此,格尔兹对西方现代政治话语中“国家”的词源学进行了剖析,并认为西方政治学过于强调国家“治理”的层面,而如果简单地把这种理解套用于其他文化之中,便会遮蔽其对于“国家”更为丰富的认识。

通过细致的民族志考察,格尔兹与安德森深刻地揭示了,当代东南亚的民族-国家版图,只是二战后承袭殖民主义遗产的“意外后果”。这种民族国家的边界划分,与传统东南亚的政治形态、文化传统、社会组织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张力,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这种杂乱的整合,恰是造成当代东南亚国家内部暴力、叛乱甚至屠杀的深层原因。^⑧ 在学术生涯晚期的《烛幽之光》中,格尔兹一针见血地指出:

① 参见牛可:《美国地区研究创生期的思想史》,载《国际政治研究》,2016年第6期。

② William Fenton, *Area Studies in American Universities*, for the Commission on Implications of Armed Services Educational Programs, Washington, DC: American Council on Education, 1947.

③ Julian H. Steward, *Area Research: Theory and Practice*, SSRC Bulletin 63, Committee on World Area Research, 1950.

④ J. Bowen, “The Contributions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David L. Szanton (eds), *The Politics of Knowledge: Area Studies and the Disciplin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4, pp.386-423.

⑤ [美]克利福德·格尔兹著,纳日碧力戈等译,王铭铭校:《文化的解释》,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5页。

⑥ Anderson Benedict, “The Idea of Power in Java Culture”, in Claire Holt (ed), *Culture and Politics in Indonesi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2.

⑦ [美]克利福德·格尔兹著,赵丙祥译,王铭铭校:《尼加拉:十九世纪巴厘剧场国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

⑧ 参见[美]克利福德·格尔兹著,甘会斌译:《烛幽之光:哲学问题的人类学省思》,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

从“殖民计划”的残骸中浮现出来的这些国家的文化构成,当然差不多到处都是极度异质的,是各族人民的大荟萃,许多情况下简直是随心所欲的——欧洲政治的短期清算碰巧把边界设在哪里,边界就在哪里……语言、宗教、种族和风俗从各种各样的角度、以各种各样的规模、在各种各样的层级上汇合,即使是最热烈的民族主义者也不可能把这当作命定和必然的而加以合理化、掩饰或搪塞。^①

到这里,人类学的东南亚研究,已经与现实政治之间拉开了审慎的距离。它不仅限于描述现实,而是试图带着批判性的眼光,从历史深处寻求现实秩序的根本性矛盾。人类学家开始意识到,欧洲的现代经验只是历史特殊论的产物,当它伴随着枪炮把自己的模式扩展到世界各地的時候,带去的不一定是文明的播撒,而是摩擦、困顿与数不清的混乱。所谓“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并非是标准模型,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等诸多新国家的涌现,与其说是对欧洲模式的强化或转世,不如说是对它的挑战。^②

总之,二战后,美国虽然在意识形态与学术传统上继承了绝大多数的欧洲遗产,但当它成为新的世界霸主并试图在世界各地施加战略影响的时候,却发现所面对的是一个被欧洲列强切割过的、破碎的世界。在理解这样的世界格局过程中,具有反思性,又能够提供深入地方性知识的人类学,便受到了青睐。早期,美国的区域研究被政治学所主导,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随着对越战的反思及研究范式的转换,人类学占据了更为重要的位置,并在东南亚区域研究中扮演了主导性的角色。不同于传统的政治学,人类学总是将“超国家”的区域或“次国家(subnational)”的地方社区作为研究对象,进而对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过程进行反思。^③ 民族国家是短期政治过程的产物,它与各国历史文化传统之间的张力,是需要被严肃对待的话题,而不是简单地将后者塞进前者的硬壳中便可以解决。

美国的人类学,自始至终都带有很强的“文化”色彩,致力于探索不同文化所建构的不同意义世界。然而,到了20世纪晚期,这种阐释主义的方法也受到了很多批评。这些批评主要指向田野工作的知识获取过程与文本写作过程,认为人类学家所传递的信息是充满了修辞的、政治的、伦理问题的,而不是如他们自身宣称的“真相”^④。此外,过于关注不同文化的独特性,并试图描述其“人格特征”或“文化气质”的做法,又从知识上把世界分隔为了一个个相对独立的文化区域。虽然文化区域未必与政治版图相互重合,但当人类学家过于关注文化多样性,并制作出一个个标准的文化模型的时候,又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人类学传统上对人类普同性的追求,并在底层构建了“文明冲突”的知识前提。这种“文明冲突”的现实与知识格局,与人类学的初衷相去甚远。

三、美美与共:新时代的中国区域国别学与人类学

从前文的叙述中可以看到,无论是英国还是美国的区域国别研究,都是在国家总体世界地位上升,对世界其他地区产生强烈知识需求的背景下产生的。今天中国区域国别研究兴起的热潮,亦与

① [美]克利福德·格尔兹著,甘会斌译:《烛幽之光:哲学问题的人类学省思》,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35页。

② [美]克利福德·格尔兹著,甘会斌译:《烛幽之光:哲学问题的人类学省思》,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14页。

③ J. Bowen, “The Contributions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David L. Szanton (eds), *The Politics of Knowledge: Area Studies and the Disciplin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4, pp. 386-423; Donald K. Emmerson, “Southeast Asia: What’s in a Name?”,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vol. 15, no. 1, 1984, pp. 1-21.

④ [美]詹姆斯·克利福德、乔治·E. 马库斯编,高丙中、吴晓黎、李霞等译:《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商务印书馆,2008年。对于冷战与美国社会科学知识生产之间的全面检视,可见 Mark Solovey and Hamilton Cravens (eds), *Cold War Social Science: Knowledge Production, Liberal Democracy, and Human Nature*,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2.

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崛起,有强烈的了解他国、认识他国的渴求有关。需要明确的是,从外交理念上,我国倡导的和平、发展、共荣等理念,与其他带有强烈等级与霸权色彩的大国理念构成了本质区别。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的区域国别知识体系构建,应当与此前的英、美两国拥有截然不同的价值取向与知识特色。

从中国人类学的发展来看,早在20世纪初期,便出现了一些对他国进行观察与研究的人类学作品,如许烺光《宗族·种姓·俱乐部》、费孝通《美国与美国人》、李安宅对印第安祖尼人的研究^①,都是其中的代表之作。这一时期的作品,带有强烈的“通过他者反观自身”的色彩,研究海外,是为了更好的认识中国社会自身。1949年以来,受当时整体社会局势的影响,中国人类学的主要关注对象在于农村社区与少数民族社会,对海外进行研究的作品相对较少。21世纪初,北京大学高丙中发起了“到海外去”的倡议,并指导学生前往十余个国家进行田野调查,为知识界提供了新时代的海外民族志研究作品。^②

正如前文所言,以“理解他者,理解世界”为旨趣的人类学与区域国别研究之间有着内在亲和的关系。在当前中国区域国别研究的知识供给中,人类学仍当扮演重要角色,并做出有中国特色的知识创新。

首先,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可以提供关于某个特定区域/国别的深度知识,并在此基础上达成跨文化理解。这种跨文化理解,当是区域国别知识体系的基石。需要阐明的是,此前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的“跨文化理解”使用的多是西方社会之中的概念,并没有真正源自中国文化、中国传统的标识性概念来理解异域。近年来,随着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意识的生发及自主知识体系的建设,开始有一些学者尝试用中国本土文化中的概念与他文化形成“对接”,突破既有的西方知识体系寻求对于他文化的理解。^③王铭铭在新近的一篇论文中亦指出,跨文化理解之本在于“己”文化,其目的是“以己化他”,借助转化使远方之见成为近处之“觉”的一部分。^④借助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往返,我们既可以更好地理解他人,也可以更好地理解自身。在这个意义上,区域国别学不仅是理解他人之学,更是理解自我之学,是真正明确中国在当今世界上的位置,建设中国自主的社会科学体系的起点。

其次,针对近年来全球化与逆全球化的新趋势,中国人类学亦当在方法上做出新的探索。自冷战结束以来,全球化的议题愈发得到了学界的关注,新的“去疆域化(deterritorialization)”状态,也为传统的社会科学研究带来了多方面的挑战。^⑤由此,人类学兴起了“多点民族志(multi-sited ethnography)”的调查方法,对全球化的联结与链条及其中的不平等关系进行了揭示。例如,政治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西敏司(Sidney W. Mintz)所著的《甜与权力——糖在近代历史上的地位》一书,便通过蔗糖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生产、消费、流通的过程,展现了“彼此互不认识的人们”如何在全球经济体系中发生关联,并由此对殖民扩张对地方(包括蔗糖的生产国与消费国)的影响展开了深刻反思。^⑥项飏也在其著作《全球“猎身”》中,分别在印度、澳大利亚等地展开田野调查,揭示了全球资本主义市场中的流动链条。

① Li An-che, “Zuni, Some Observations and Queries”,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vol. 39, 1937, pp. 62-76.

② 高丙中:《置身世界之中的知识生产——共同体意识与海外民族志》,载《开放时代》,2010年第2期。

③ 如梁永佳试图用老子提出的“贵货”“不积”概念理解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库拉交换,详见梁永佳:《贵货不积:以<老子>解读库拉》,载《社会学研究》,2020年第3期。

④ 王铭铭:《从文化翻译看“母语”的地位问题》,载《开放时代》,2023年第1期。

⑤ Arjun Appadurai, “Disjuncture and Difference in the Global Cultural Economy”,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vol. 7, 1990, pp. 295-310.

⑥ [美]西敏司著,王超、朱健刚译:《甜与权力——糖在近代历史上的地位》,商务印书馆,2010年。

在“序二”中,项飏对所采用的方法论进行了阐述。他写道:

在我的研究中,安得拉邦的农村、海德拉巴市、吉隆坡和悉尼之间的联系并不都是可以立即观察到的,而直接观察到的联系都是片段式的:一个海德拉巴人正在吉隆坡找工作,另一个则因为身在悉尼的亲戚拒绝为他提供移民担保而备受困扰,还有一个刚从悉尼回到海德拉巴,要招收去吉隆坡的工人……为了厘清这些流动和联系,一个抽象化的过程十分必要。抽象化将各种联系和流动组织在一个概念体系当中,给那些相互关联的地点赋予结构上的位置和制度上的意义。我关心的不仅是显现的、行动者自己意识到的种种跨国联系,更重要的是去发掘那些通常被认为是毫不相干的现象之间的联系,从而揭示出我们以前尚未意识到的问题。^①

可以说,我们每个人在日常生活中所接触、所感知的世界,都只是片段的、部分的,而学术研究的责任,则是从这些碎片化的个人经验中,寻找内在的制度关联。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国的区域国别研究仍旧停留在按区域、按国别划分的阶段,这种按照既定政治版图划分的思路,会形成知识上的相互割裂,难以对流动性、联结性、整体性等议题进行关注。事实上,今天世界中区域/国别的分割,是地理图景与政治过程相互叠合的产物,而由市场等贸易行为生发的打破边界,沟通全球的意愿,是当今世界不可忽视的另一股力量。对于这种跨区域、跨国别的现象,人类学有着方法上的巨大优势,既可从物与人出发,以小见大,从微观层面对政治经济过程及其内在动力进行揭示,亦可通过跨越边界的研究,更好的思考边界带给人群的积极与消极意义。^②

最后,基于和平、基于共享理念的中国人人类学家对世界的理解,可为新的世界秩序构建提供基础性原则。作为后发现代性国家,我们是在相对晚近的时间节点进入世界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被迫接受了西方列强已界定好的世界秩序与指导原则。西方政治经济秩序推广到全球的过程,也是从知识上重塑全球图景,形成以西方为中心的知识霸权的过程。在前文的叙述中已经提及,无论是英国还是美国,都曾经试图用“他者”的知识体系反思自身,然而,受限于一神论的框架,这种反思仍旧是有限的。^③而中国人人类学界当前面临的重大知识任务,便是对此前整体性的“西方”知识,及其中蕴含的前提与假设进行全面检视。

著名中国研究专家费正清曾指出,传统中国的世界观是以“天下”为核心的,这是一种不同于近代民族-国家为单位,以霸权和实力为基础的世界想象,在现代世界秩序形成的过程中,它的价值被不断贬低,而中国亦在现实进程中艰难的适应这套秩序。^④逐渐的,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增强,我们也不断地提出与西方不同的秩序理念。纵观新中国成立以来 的外交政策与国际战略,毛泽东先后提出的中间地带、三个世界理论,以及近年来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理念,都是试图突破传统世界格局,重构世界图景的努力。我国的出发点,不是要建立霸权秩序,而是要在追求本国利益的同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促进各国共同发展。

在这方面,人类学尊重他者、平等互惠的价值关怀,与我国倡导的国际事务处理原则有着深刻的内在相通之处。我国著名的人类学家、社会学家费孝通在晚年的论著中,在这一点上做出过精辟的说明。1997年,为了回应全球化给人类文化多样性带来的挑战,费孝通提出了“文化自觉”的概

① 项飏著,王迪译:《全球“猎身”——世界信息产业和印度的技术劳工》,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48—49页。

② 参见麻国庆,“跨区域社会体系视角下的区域国别研究”,载《学海》,2022年第2期。

③ 此前,已有数位学者对西方整体社会思想中的犹太-基督教底色进行过反思。参见〔美〕马歇尔·萨林斯著,王铭铭、胡宗泽译:《甜蜜的悲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Marshall Sahlins, *The Western Illusion of Human Nature*, Chicago: Prickly Paradigm Press, 2008; 赵汀阳、〔法〕阿兰·乐比雄著,王惠民译:《一神论的影子》,中信出版集团,2019年。

④ 参见费正清主编,杜继东译:《中国的世界秩序——传统中国的对外关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

念。根据费先生的阐述,“文化自觉”意味着在一定文化中的人,要对自己的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的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发展的趋向。在此基础上,也要“美人之美”,要能够从别人和自己不同的东西中发现美的地方,进而达致各个民族间和国家间和而不同、和平共处、共存共荣的局面。^① 2000年,在世界人类学大会主席会议上,费孝通先生提出“创造和而不同的全球社会”,这当是我们今天思考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社会层面的概念性判断。^②

杨清媚也在其新撰写的论文中一定程度地呼应了费先生的观点。她指出,中国的人类学,本当是研究文明的人类学,它追寻的是超越民族国家边界的广义人文关系,可为不同文化之间的沟通和解释提供渠道和基础。^③ 自学科创始起,人类学便始终追求对人类普同性与多样性关系的理解,此前英美的人类学家,也试图在这方面进行努力。然而,受制于霸权主义意识形态,这种探索或成为文明等级论的注脚,或局限于某些“文化碎片”的呈现,没有能够真正在人类普同性的基础上寻求共生之道。与之相对,生长在中国知识文化传统中的人类学,始终带有和平的追求与天下的胸怀,这使得它从根源上便具备了与西方人类学不同的价值关怀。在当代中国,探求人类文明的多元基础,寻求替代西方“文明冲突论”的世界秩序方案,是人类学与区域国别研究有机结合之后当形成的知识贡献。

人类学不仅是民族志,亦是一场思想实验。正如当代著名人类学家蒂姆·英戈尔德(Tim Ingold)写道:“我所提出的人类学是要求意识到并接纳他人的存在,学习他们的生活经验,并且将这一段经历带回到我们的想象图景当中。这一图景乃是关于人类生活应当是怎样的、未来状况如何、存在何种可能性的。于我而言,人类学建立在这种想象力和经历的结合之上。”^④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既当尊重不同文化、不同国家、不同社会的多样传统,又当探求人类作为集体种属的共性,并进而明确“命运共同体”未来的方向。追求他者与自我之间的知识互惠、文化互惠、利益互惠,才能真正地达致“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境界。

Abstract As a cross-discipline, the area and country study has become a new growth point in the current domestic academic circles, in which anthropology with the mission of “understanding others, understanding the world” should play an essential role. This article reviews the area and country studies of the UK and the US, traditionally two great powers, and analyzes the knowledge contribution of anthropology in them, arguing that fieldwork advocated by anthropology as methodology can provide a knowledge basis for cross-cultural understanding. In addition, anthropological attention to cross-regional and cross-country mobility can be a useful complement to country-specific studies. In the area and country studies in China in the new era, anthropology should organically combin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raditional discipline with Chinese national context, while searching for new theoretical and methodological dimensions under the guidance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刘琪,研究员;杨成,教授,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上海,201620)

[责任编辑:邓颖洁]

① 费宗惠、张荣华编:《费孝通论文化自觉》,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

② 麻国庆:《跨区域社会体系视角下的区域国别研究》,载《学海》,2022年第2期。

③ 杨清媚:《中国人类学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探索》,载《中国社会科学》,2022年第3期。

④ [英]蒂姆·英戈尔德著,周云水、陈祥译:《人类学为什么重要》,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